

自由史家與在野幕僚：郭廷以的兩重身分

The Two Identities of Kuo Ting-ye: Liberal Historian and Non-Governmental Official

楊金華 (Yang Jinhua) *

一、引言

作為「南港學派」奠基人，郭廷以（1904-1975）在臺灣學術界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廣，可謂有目共睹、眾所皆知。自 1948 年 12 月抵臺至 1969 年 9 月飛往檀香山，在臺生活凡二十載。不過，他並未選擇在臺灣安享晚年，而是寄居美國渡過餘生。在眾多門生故舊的回憶錄中，不乏對其晚年被迫流落異鄉的激憤之言。郭正昭憤憤不平地表示：「三十年後的今天，我作為一個片段的追隨者與見證者，還是要堅持地說：國家對待這位學術大佬，這位功力學派的史學泰斗，這位國師級人物，在道義上有很深的虧欠的。」¹

一直以來，在多數學人眼中，郭廷以堪稱一個不折不扣的客觀主義史家，對現實政治不聞不問。然則，作為身處時代洪流之個體生命，他能完全躲進書齋，對現實政治不聞不問嗎？黃自進先生在《近代中國史綱（重排本）》序言中指出：「郭廷以在世變之際來臺，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場。」²初讀之後，獲益匪淺，禁不住繼續追問：郭廷以是國民黨的忠實擁護者嗎？他與國民黨高層有無密切聯絡？由於前人大多語焉不詳，職是之

故，下文擬徵引相關已刊與未刊的書信、日記，輔以國史館藏蔣經國的書信，俾對郭廷以與國民黨高層的交往略加鉤沉，試圖對其政治立場、學術取向與家國情懷有進一步認識。

關於郭廷以對自由主義的企慕，門人弟子早就看在眼里。在《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中，張朋園先生強調：

其實出身南京保守派的郭廷以先生是國民黨培養出的傑出學者，政治立場相對保守。但是他隨同政府遷移臺灣之後，跟一批信奉自由主義的學者有所接觸，或多或少受到他們的影響，使得郭廷以先生也逐漸認同自由主義的主張。³

郭廷以是否是國民黨培養出的學者，言人人殊。若將他轉向自由主義的時間訂在赴臺之後，恐怕並不符合實情（至少仍需更多直接材料證成）。或許，其在早年讀書時期，便已孕育了若干自由主義的萌芽。

二、融中西新舊於一身

1904 年 1 月，郭廷以出生在河南省舞陽縣一個沒

* 作者現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1 沈懷玉訪問，〈郭正昭先生訪問紀錄〉，陳儀深等編，《南港學風——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頁 327。

2 黃自進，〈推薦序〉，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重排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頁 3。

3 黃克武訪問，〈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 148-149。

落的中產階級家庭。當年，朝野上下正在掀起一場科舉停廢之爭。翌年，科舉考試正式被清廷諭令廢止，代之以新式教育。儒家經典雖不再被奉為士人晉升的主要憑資，但在廣大的鄉村社會，依然享有頑強的生命力。在郭廷以童稚時期，便熟識《三字經》、《論語》、《孟子》、《論說文苑》，孕育了「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為人處世之道。他說：

我在四年級時，大伯父說四書也應該讀讀，他常將《論語》說給我聽聽，我覺得也頗有道理，進而要求先生講《孟子》。此外又有「修身」，以深入淺出的方法，講些起居應對的禮節以及做人的道理，對當時的小孩影響很大。⁴

1916年12月，陳獨秀接獲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書，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也隨之遷往北平。當時中國的思想界正在發生巨大變革，以胡適、陳獨秀為中心，旨在宣揚德先生、賽先生等新式文化理念的文化革命正悄然來襲。彼時的文化重心雖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但思想的勁風已漸次吹向內陸省份。作為河南省會的八朝古都——開封，自然得沐浴新潮流之機。1918年，在家鄉完成十年的知識啟蒙之後，郭廷以決定外出求學，追尋更廣闊的知識天地。⁵幾經輾轉，以「狀元身分」考取河南省立第二中學。除日常修讀國文、修身、歷史、英語、博物課程之外，還從嚴復、梁啟超、劉師培、章太炎等文化名流著作中汲取養分。⁶正是在開封，郭廷以遇到了在家鄉口耳相傳的北大才子——王芸青。⁷由於「陳獨秀常寄《新青年》、《每週評論》給他，我們從他那裏看到這些雜誌。」對於這兩份難得一見的刊物，郭廷以視若珍寶，反復閱讀，不由得品評道：「《新青年》言論沒有《每週評論》激烈，後

者煽動性大極了。」⁸

可以說，嚴、梁、胡等文化鉅子「開民智」的文化踐履，一步步驅策郭廷以走向學術研究之路。依其所見：

我進中學後很喜歡讀書，幾乎商務印書館出什麼新書我都看，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出版我就買了，梁任公先生《中國思想史》沒寫完，我看了以後說：「他沒寫完，我將來要完成它」。⁹

通過對《新青年》、《每週評論》反復閱讀，郭廷以像眾多青年學子一樣，不僅浸淫於民主、科學、自由的學術風氣，並時常以「新青年」標準要求自己：「每當一件不幸的消息傳來後，我們同學就在操場三三五五、議論紛紛，大談國家大事。」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舉國譁然，各地紛紛舉行遊行集會。舉凡遊行示威、抵制日貨、聲討政府的活動，郭廷以無不參與。不惟如是，他還與好友曹聯亞、劉芸林一道發起開封學生聯合會，編輯《開封學生聯合會週刊》，「除了收集稿件編輯外，也寫了不少攻擊安福系捧吳佩孚的文章。」¹⁰概言之，在開封求學期間的郭廷以，儼然一個標準的、思想急進的進步青年。

1920年初，由於不堪校內保守派的攻擊與謾罵，郭廷以與曹聯亞、劉芸林等幾個自詡「新派」的同學離開了開封。同年6月，插班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1923年6月又被保送至東南大學歷史系。進入大學之後，彷彿大夢初醒，對於遊行示威興味索然，將主要精力用於讀書。¹¹

在南高師國文教師許誠援介之下，郭廷以得機親炙國學大師柳詒徵請益並獲賜《中國文學史》一書。一番

4 郭廷以口述，張朋園等整理，《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37。

5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51。

6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58-59。

7 王芸青生於河南舞陽，畢業於北京大學。二人有同鄉之誼，王對郭十分照顧。

8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60。

9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60。

10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61-63。

11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95。

交流之後，柳這樣勸他：「你們不要受胡適影響不看舊書，要有本領把《史記》、《漢書》都標點出來才好。」¹² 郭廷以接受了「不要受胡適影響不看舊書」的規勸，但沒有走上正宗「南高派」的治史路徑。與之相反，卻對柳詒徵的研究方法有所保留，嘗言：

我在讀課外書及研究近代史的興趣方面固然受他影響很大，但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不大贊同他的方法，比如他不重視考證，對歷史這門科學不下考證功夫如何下結論呢？¹³

正如郭廷以對柳詒徵的治史路徑有所保留，他也沒有對胡適亦步亦趨，諸如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上卻是南轅北轍。¹⁴ 雖然案頭擺放著胡適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但是《左傳》、《韓非子》、《淮南子》等傳統文化典籍依然在他的閱讀世界佔據一席之地，同樣滋養著他的精神世界。

在 20 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如何安放新學與舊學的位置，可謂百家爭鳴、你方唱罷我登場；全盤西化者有之，一味復古者大有人在，主張相容並蓄者也不乏其人。郭廷以雖未直接發出聲音，但找到了一個正確處理新舊學的方法：以一個客觀的、中立的立場，兼采中西治史精髓，摒棄政治偏見與個人好惡。這種絕對客觀、溫情的文化立場一直延續到生命終結。雖然缺乏直接材料驗證胡適宣揚的「自由主義」學說在郭廷以心裏激起了怎樣的迴響，考慮到他有長期閱讀《新青年》、《每週評論》、《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經歷，不難得出正面結論。¹⁵ 實際上，郭廷以不僅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浸洗，而且還一度躬逢共產主義的薰染，不僅閱讀過《社

會主義史》、《階級鬥爭論》、《共產黨宣言》等名噪一時的宣傳社會主義的論著，還一度被中共革命領袖惲代英邀請加入社會主義研究會。他晚年回憶稱：

快畢業時惲代英來南京活動，開討論會時他說得最多，大罵軍閥，說現在是工人最為重要，我想我國現在有幾個工廠，有幾個工人？為什麼其他人就不重要了？不相信這種說法。惲代英和我談了幾個鐘頭，勸我參加活動，我不感興趣。¹⁶

如果說胡適僅僅是郭廷以獲取自由主義思想的啟蒙者，那麼羅家倫的言傳身教則使之更加具體化。作為昔日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羅家倫深感遊行示威並不能將中國從列強環伺的泥淖中拯救出來，便毅然決然丟掉「五四運動領袖」的虛名，負笈海外，追尋學術救國之夢。1926 年 8 月，遊歷美國、歐洲數年之後，羅家倫搭乘駛往中國的輪船，「意欲在回國後悉心研究之餘，略盡扶植訓練後進之責，為中國史學開一蹊徑，而置之於科學的基礎之上」。¹⁷ 在上世紀 20、30 年代，中國近代史學科尚處於初創階段，無論是學科體系的搭建，還是研究人員的培育，恰似一片處女寶地，亟待開發。時過境遷，羅家倫當年扶植訓練後進，多數早已不為人知，郭廷以可能是成就最彰、名氣最大的一位。在羅家倫的指引之下，郭廷以很快發現了這片可以大展宏圖的學術園地。雖然已從柳詒徵那裏初步領悟到中國近代史的魅力，但羅家倫所帶來的全新治史理念與研究視野，令其大開眼界，人生軌跡自此轉向：

從前關於中國史方面偶爾也看到外國人寫的東西，但總覺得很膚淺，只承認外國人可搞中西交

12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 74。

13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 94。

14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 76。

15 郭廷以在晚年對胡適所堅奉的自由主義立場十分認可。1959 年 11 月 20 日，《自由中國》半月刊舉行七十周年紀念餐敘，當時胡適演講「自由與容忍」，郭廷以認為胡「持論頗稱平正」。又如 1960 年 10 月，雷震意欲在臺灣組織反對黨。胡適為雷震講話，藉以表示臺灣尚有言論自由，郭廷以並希望反對黨事可以暫緩，勸諫雙方均勿意氣用事。郭廷以亦持此見，稱讚「胡先生確頗顧大體，處處訴諸理智」。陸寶千等整理，《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頁 150、221。

16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 79。

17 羅家倫，〈致張元濟函〉，1926 年 4 月 8 日，羅久芳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書信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 237。

通史。羅先生來了後介紹 Morse 的書，我立即花三十大洋從上海買來，仔細一看，許多材料是我過去所沒看到的，見解也無可厚非，不可輕視。觀念變了，開始注意外國資料。¹⁸

「注意外國資料」使得郭廷以可以及時追蹤西方學者的前沿成果。赴臺之前，便出版了《太平天國曆法考訂》、《近代中國史》、《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等三本專著與數篇研究專文。雖然數次錯失出國留學的機會，無法親身徜徉於西方波譎雲詭的史學浪潮，但憑藉幾十年如一日的勤奮苦讀，已然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代宗師，確立了在臺灣近代史學界首屈一指的學術地位。因此，當朱家驊決定在中研院增設近代史研究所時，不惜得罪李濟、全漢昇、董同龢等一眾史語所耆宿，一再堅持非請郭廷以出山不可。

三、踐行學術自由

1955 年 2 月，郭廷以應朱家驊之邀，出任近史所籌備主任。在擬定的研究計畫當中，學術自由與走向海外被奉為亘古不變的圭臬。為實踐此一主張，他在 8 月「將近史所籌備情形及研究計畫，分別函告國外各有關學術機關，並請隨時聯繫。」¹⁹ 很快，美國各主要學術機構均有積極回覆。諸如費正清在回信中稱：「Your new Institute has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and I know that it will accomplish a great deal of value for u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²⁰ 在這種純粹學術自由理念的驅策之下，郭廷以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韋慕庭（C. Martin Wilbur）、鮑大可（Doak Barnett）、戴德

華（George Taylor）、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梅谷（Franz Michael）、芮瑪麗（Mary Wright）、市古宙三（Chuzo Ichiko）、村松祐次（Muramatz Yuji）、杜希德（D. C. Twitchett）等眾多海內外漢學研究中心的掌門人建立了密切的交誼。近史所也在短短數年間與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京大學、耶魯大學、東洋文庫、夏威夷大學、京都大學、高麗大學、倫敦大學等橫跨亞、歐、美三大洲的十幾個高校的漢學研究機構（中國研究中心），締結研究人員互訪、圖書資料互換的合作協議。

國民黨政府遷臺伊始，島內「反共抗俄」的呼聲不絕於耳。早在近史所籌備之初，國民黨高層有意讓近史所充當反共急先鋒，俾與中共革命話語一爭高下。²¹ 然而，郭廷以不願成為政治傀儡，視而不見。對於近史所獨有的自由學術氣氛，曾在近史所短暫工作過的魏廷朝，逕以「無法無天所」稱之。²² 在上世紀 50、60 年代，受制於國民黨政治高壓，不惟學術性的中共研究被視為禁區，抑且客觀的民國史研究亦舉步維艱。有鑒於此，近史所將精力用於編整清季總理衙門檔案，甚少關注與現實政治走向極為密切的民國政治史、中共黨史。雖然外間不乏批評之音，郭廷以始終不為所動。對其此舉，胡適大致認可，嘗言：「這個時候做民國史，誰肯作客觀的論斷？」²³

另一個可以體現學術自由的例子，便是廣納賢才，拒斥門戶之見。最初進入近史所工作者，以師大學生居多，但並未將臺大、政大的學生拒之門外。據不完全統計，在郭廷以擔任近史所所長期間，至少有 18 位出身臺大的學生曾進入近史所工作。²⁴ 縱使得知被情治部門

18 《郭廷以先生口述自傳》，頁 109。

19 郭廷以，《與朱家驊二》，1955 年 8 月 31 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6。

20 John King Fairbank, "To Kuo Ting-ye", 1955 年 8 月 17 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郭廷以檔案」，檔號：069-01-02-206。

21 1965 年 7 月 10 日，國民黨第六組主任李白虹向蔣介石請示，「由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僱有華籍研究人員唐德剛等 3 人，以錄音方式錄李宗仁口述回憶錄」，在結論中稱「中共佔據大陸不是毛澤東贏了，而是蔣某人輸了」，便建議「使我有學術地位之學者如李濟、郭廷以等影響該校來華博士候選人，使此書永不能公開出版」。（臺（54）央秘字第 106 號谷鳳翔、謝然之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會藏「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檔號：總裁批簽-540052。

22 張慶惠編，《賭鬼的後代——魏廷朝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17），頁 87。

23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校訂版（1961-1962）》（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頁 3853。

24 分別為：賀凌虛、李念萱、許淑貞、王樹槐、謝文孫、夏沛然、張存武、王萍、吳章銓、魏廷朝、施士哲、馬天剛、趙中孚、郭

無辜押拘、出身臺灣大學的呂士朋，郭廷以亦不畏權勢，在其求職無門、無處安身之時，邀其進所。縱使無辜「二進宮」之後，郭廷以依然為其保留職位。²⁵ 尤有甚者，就連涉嫌「國家分裂行為」的約聘助理魏廷朝，郭廷以也未與之劃清界限，而是伸出援手，積極搭救希望其回頭是岸。1964年9月，魏廷朝與臺灣大學教授彭明敏、謝聰敏因散發〈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下獄。「彭案」發生後，蔣經國十分重視，意欲與郭廷以面商解決方案。²⁶ 郭在日記裏寫道：

下午應經國約，……談彭、謝、魏案，經國云此非法律所能解決，應從政治上著眼，但不能不經過法律程式，盡可能從寬，囑余與魏廷朝一談。五時警總政治部李志儉來迎，同到軍法處看守所，魏廷朝表示甚好，頗有悔意，一切自願認錯。余力勸之，勸冷靜思慮。²⁷

「彭案」不僅在島內引發轟動，更引起美國學界密切關注，韋慕庭以「we are deeply concerned」稱之，費正清一度在 *New York Times* 上撰文聲討國民黨戕害學術自由、違背民主政治的行為。尤有甚者，費正清還聯合韋慕庭、費維愷一起致書王世杰，表達抗議。縱然郭廷以在福特基金會二期補助申請一事上有求於費正清，但他依然不卑不亢，直言「彭案」乃國家分裂行為，與學術自由毫不相干。²⁸

由於中國大陸與外界隔絕，美國學者研治中國近代史大多希望到臺灣搜集檔案。關於哪些資料可以開放、複製，沒有明文法令可資參照。²⁹ 費正清雖能源源不斷

地介紹學生赴臺查閱，但終歸員額有限，加之所費不貲，故有意與近史所合作，在臺大規模攝製資料。彼時近史所也在日本、美國、英國大量購置檔案縮微，因而對費正清亟欲獲取研究資料的迫切心情，郭廷以頗能感同身受，「其意雖在此項資料得以供外國學者之用，要亦為應當之事。」³⁰ 1963年12月，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赴印度參加第二十六屆東方學人大會，特意飛到臺北與郭廷以洽商在臺灣合作攝製史料。郭廷以十分審慎，決定直接請示蔣經國，「韋慕庭提出攝製資料問題，經國表示甚好，主由近史所主持其事，再由中美人士合組委員會策劃進行。」³¹

蔣經國如此開明，顯非一時衝動。2月18日，「李錫俊電話通知，蔣經國先生對中美互換研究資料事完全同意，一切交由郭廷以全權負責。郭「即請其通知司法部調查局，約期詳商，並擬再與經國面談」。隨著赴臺學人查閱資料漸多，臺灣高層也有意改善先前作法。1964年1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負責人謝然之約請十餘名政學菁英，商討如何增進美國學人瞭解臺灣問題。郭廷以憑藉既往與美國學人打交道的經驗，倡議不應在美國學人查閱檔案時設置重重關隘，而是應該「出以坦誠，予以研究便利，明示限度，並撰寫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歷史專書，以證中國確為一有能力、能自救之國家。」³² 1966年9月，中美人文社會科學會議在臺北召開。席間討論大陸研究情形，「吳俊才報告國際關係研究所概況，美方代表多所詢問」。吳氏不置可否，郭廷以挺身為之解圍：「此項工作確屬重要，但必須審慎，顧忌實際情形，不可期望太奢，可就若干問題與有關機構洽商。」³³

正昭、胡耀恒、劉鳳翰、王璽、陶英惠。

25 呂士朋，〈呂士朋先生訪問紀錄〉，陳三井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60。

26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5年1月16日，頁545。

27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5年1月22日，頁533。

28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5年2月12日，頁551。

29 張朋園，〈回憶量宇師〉，陳三井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頁104。

30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0年5月28日，頁188。

31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3年12月30日，頁458。

32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11月21日，頁533。

33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6年6月17日，頁653。

四、蔣經國的在野幕僚

如果將郭廷以視作一個完全不聞政治的自由主義信徒，實與史實未必完全契合。與之相反，他對政治向來十分關心，只不過不像胡適、傅斯年那般時常訴諸報端罷了。在為數不多的以中國近代史研究著稱的學者中，郭廷以擁其他人難以比肩的政界人脈。舉凡胡宗南、戴笠、陳誠、朱家驊均有直接交情，就連蔣經國也奉為座師。由於缺乏直接材料的比堪，郭廷以與蔣經國何時結識不得而知。不過，他在1971年致李煥信中有「三十年來，兄與教育長知之尤稔」一語，不難推知在抗戰期間業已結識。

七七事變之後，神州大地為之震動。為因應抗戰建國之需要，國民政府於1943年醞釀設立中央幹部學校，由蔣經國負責，以培養幹部人才為終極鵠的。次年開始招生，分設研究部與專修部。「研究部招收各大學畢業生，以文史哲學暨社會科學為主要課程；專修部招收高中畢業生，以財務管理、交通管理等事務課為主。中央幹部學校籌備期間，蔣經國先生聘請中央大學教授王政先為教務處長，王先生因與教育界關係深厚，故聘請了各大學資深教授多人來校兼課。」在邀請的教授名單中，郭廷以也位列其中。據李煥回憶：

西洋史權威教授沈剛伯、學貫中西的哲學教授方東美、數學大師管公度先生、三民主義理論家任卓宣先生等，均為一時之選，郭量宇先生亦在受聘之列，其講述近代史如數家珍，對百年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蠶食瓜分的情形沉痛萬分，不時期勉我輩青年應以報效國家為職志，語重心長感受殊深，我有幸考取中央幹部校研究部第一期，從此受業於郭先生門下，啟迪教誨，受益良多。³⁴

正是基於在中央幹部學校授課的機緣，郭廷以結識了李煥、潘振球等後來深得蔣經國器重的「四大金剛」。

1948年12月，國共政爭大局未定前夕，郭廷以應時任中央大學校長周鴻經委派，赴臺遴選校址。最初係孤身赴臺，後因大陸失據，家眷也適時抵臺。

1949年，中央幹部學校遷往臺灣。旋即，組建校友會，將每年5月5日定為校慶日。為增進師生情誼、加強政治往來，蔣經國授意李煥組織宴會。除幹校學生之外，授課教師也在邀請之列。每年聚會之時，郭廷以均在受邀之列，並被奉為座上賓。³⁵為完成反共救國大業，臺灣當局在1952年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蔣經國任主任，李煥任秘書。蔣氏極為重視青年的教育工作，慨言教育功能的發揮，有賴學界領導。因此，蔣經國多次撥冗拜訪各大學教授，舉凡臺大的沈剛伯、方東美，政大的劉季洪、陳大齊，師大的郭廷以、管公度等人均在其中。反共救國團的授課講義大多聘請專人編寫，郭廷以也是受邀專家。他不僅為之編寫了《百年來的中國》，而且還將書稿《俄帝侵略中國簡史》公開付梓，以為當下的反共抗俄大業提供歷史借鑒。客觀言之，由於蔣經國忙於「反共救國團」公務，郭廷以也因教書、行政忙得不可開交，兩人雖「同在臺北之時，因為事忙，彼此亦並未時常見面，不過大家皆有共處一地之感。」³⁶1957年11月，郭廷以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前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洽談合作計畫。此番是郭廷以的首次美國之行，除接洽合作、結識友朋之外，還與留美學生頻繁接觸。對於郭廷以此番出國，蔣經國也是十分關切，託潘振球、薛光祖代為致意。³⁷有感於蔣氏的一片盛情，郭廷以報告了留美中國學生的思想現況：

此間中國學生約近百人，亦晤見不少，十之六七，均為有志之士，值得吾人注意。間有對臺灣情形，不甚瞭解者，而大致無甚惡意。遇有機會，自當隨時解說，尤望大家能明瞭教育長之立場。青年團方面於留美學生工作，似應加強，此意希便中向教育長陳說。³⁸

34 李煥，〈追念一代學人郭廷以先生〉，陳三井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頁2。

35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0年5月5日，頁183。

36 蔣經國，〈致郭廷以〉，1958年3月1日，國史館藏「蔣經國總統文物」，檔號：005-010502-00767-002。

37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58年2月6日，頁37。

38 郭廷以，〈與潘振球〉，1957年12月5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37。

郭廷以筆下的「教育長」，正是蔣經國。潘振球一俟得信，便轉交蔣經國。蔣「奉讀手書，無任汨慰」，回信以「在此國家多難之秋，吾人惟有盡心力撐危局，方能渡過今日之難關，以爭得反攻之勝利」相期勉。³⁹至遲在此時，蔣經國已將郭廷以視作心腹，故對近史所工作格外支持。1959年11月，郭廷以不堪史語所學人杯葛，向胡適提交辭職函。蔣經國得知後不以為然，「力囑勿辭，謂此一工作，關係至為重要。又云凡事應忍，不可操之太急。」⁴⁰

郭廷以雖只是眾多追隨國民黨之一員，但在蔣經國眼中，卻是一個不可多得、可以彼此坦誠相待的知己。蔣經國不僅多次親赴郭廷以家中拜年，而且還派潘振球、李煥等人趨謁請益。1964年2月，潘振球至郭府拜訪，「均望當局大事振作，一新耳目，振球請余與經國懇談。」⁴¹毋庸諱言，潘振球、李煥雖被視為蔣經國的左膀右臂，權傾一時。縱然如此，亦做不到無話不談。此時，郭廷以扮演的角色就顯得格外重要：

李錫俊云：一、經國糖尿病頗不輕，必須注意，囑便中勸告。二、臺灣局面極需有新的措施，以振人心。余云軍事應尚精兵，教育應重品德，經濟應求發展。三、潘振球將長教育廳，頗合適。四、嚴家淦才具有限，陳辭修常加干預，不知所從。以上各事，遇機當與經國懇談。⁴²

「遇機當與經國懇談」一語顯示郭、蔣關係之密切。蔣後來執掌國防部，郭認為「甚適當」。⁴³大多數

情況下，郭廷以對政局的體認與思考，經由李煥、潘振球傳到蔣經國耳中。1964年6月，李煥、潘振球至郭廷以府上閒談，均謂經國應開放胸襟，更須留意教育，收攬臺省青年有為之士，廣交非國民黨而開明之人物。⁴⁴「振球、良規來，談至深夜，對臺灣情勢均頗憂慮，當政者必須及早改革挽救，簡化體制，起用新人，轉移風習，減免擾民之政，改革教育、軍警待遇，事事反求諸己，方足以振奮人心。」⁴⁵11月19日，李、郭再次長談，「均謂必須穩定臺灣局面，轉變作法」。談到深處，郭廷以大膽提議：「不妨由蔣廷黻主政，裁軍減政，提高治安、稅務、教育人員待遇，切忌擾民，準備依照正軌逐漸轉移權力。」⁴⁶

有時，郭廷以也直接向蔣經國進言，「應經國約，談時局，均感問題頗多」。郭當即建議：「盡其在我，尤應重視教育及黨務，改變風氣最為重要，用人以品德為第一，才學第二。」⁴⁷鑒於當局素不重視國內人才，總以為在國外者始係第一流學者，郭廷以適時提醒蔣經國應邀請海外青年學人返臺，每年若能設法邀請二、三十人返臺作數月考察，長此以往下去，人才缺乏現象不難有較大改觀。⁴⁸是以，郭廷以雖未進入仕途，但已贏得蔣經國的信賴，用「在野幕僚」稱之，亦不為過。

當然，也應該知曉，郭廷以雖十分敬重蔣經國，但絕不唯唯諾諾、一味奉承，而是保持學者自身應有之獨立尊嚴。諸如，費正清在1964年訪問臺灣時，因最近*China Quarterly*臺灣專號對臺灣議論偏見太甚，執筆多為費正清學生⁴⁹，蔣經國「責其對臺灣造謠污蔑，不願

39 蔣經國，〈致郭廷以〉，1958年3月1日，國史館藏「蔣經國總統文物」，檔號：005-010502-00767-002。

40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59年11月16日，頁149。

41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2月16日，頁470。

42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2月26日，頁473。

43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5年1月13日，頁544。

44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6月4日，頁496。

45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11月14日，頁531。

46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11月19日，頁532。

47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5年1月22日，頁546。

48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6月29日，頁501。

49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3月31日，頁480。

與之相見」。郭廷以聽後不以為然：「經國此種表示，不免稍有意氣」，蓋「費正清亦深不以該專號為然。」⁵⁰為緩和費正清對臺灣的政治偏見，郭廷以出面調和。1964年4月，「費正清來談此行觀感，謂四年以來，臺灣學術研究及經濟發展均有良好進步，渠對中國抱衷心希望，個人無任何政治企圖」。郭廷以則將臺灣面臨的諸種困難坦誠相告，並再三叮囑費正清：「在目前環境，不可責之太切。」⁵¹

在上世紀50、60年代，臺灣師範大學堪稱島內師範教育的翹楚。不過，教育繁盛的背後，卻是積弊叢生、暗潮洶湧。任教師大期間，郭廷以因兢兢業業的教書心態，贏得了校長的充分信任。1959年10月，時任文學院院長梁實秋因故請辭，杜元載連日見訪，堅以文學院院長相囑。郭廷以一度不願接手，但在杜元載、胡適勸說之下，勉強應允。當時「師大文學院及英語系內部問題頗多，各學系員額既無一定，分配失平，課程亦太凌亂，而英語系與英語教學中心之關係尤須調整。」⁵²一俟上任，郭廷以便著手改革。或許看到郭廷以在院長任期內的優良表現，蔣經國有意將其推向校長之位。郭廷以不願出任，蔣經國固執己見，派李煥、潘振球輪流登門勸說。1965年11月，「李錫俊來，重行說明師大事決定經過，及經國誠意，如再堅拒，將使難堪」。既已如此，郭廷以只得勉強接下這個「燙手山芋」，「俟與（經國）當面一談，至多以一年為期，然必須請錫俊相助。」⁵³次年，臺灣省政府主席黃傑與教育部長閻振興在校長任命人選問題上各持己見。郭廷以深悉各方政治博弈原委，更加不願牽連其中，「此事唯一顧慮為經國是否見諒，必要時當懇切說明」⁵⁴。他在日記中寫道：

晚到良規處，振球繼至，謂臺省主席黃杰決定師大易長，命與閻振興相商，閻請其先探余之態度。余力言事已過去，切勿再提，余既乏興趣，精力亦不可勝任，僅願以餘年將近史所充實。師大事煩，必須年富力強，事業欲旺之人。代向經國婉陳。且此事就余瞭解，經國與黃杰之間，不無意見，余更不值得夾在其中。良規與余同薦李新民，甚望能獲經國同意。⁵⁵

1966年7月，蔣經國不再堅持，郭聽後為之釋然，「惟微覺有負其盛誼」。⁵⁶雖然郭廷以「負其盛誼」，蔣經國並未見怪。雙方仍然相敬如賓，李煥、潘振球、唐振楚等人依然執紼弟子禮。

躲過了師大校長「一劫」，郭廷以沒能避過白色恐怖。1967年8月，郭廷以帶領臺灣23名學者前往密西根大學參加第二十七屆東方學人大會。原本只是一場世界東方學人交流學術的饕餮盛宴，不意竟被黎東方、何浩若等人將之譏之為「賣國賊」。郭廷以被指為費正清的「同路人」，向其「出賣國家檔案」。此論一出，批評、質疑之聲接踵而至，更引得若干立法委員揚言調查「近史所是否為費正清控制」。平白無故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郭廷以不知所措，向李煥去信求助。李煥請示蔣經國之後，回信安慰道：「關於國際東方學人會議，黎東方、方豪、黃大受諸人雖然寫文談及，但在臺北似無任何影響，因諸人過去作風，向為學術界所不齒，何浩若更無足論矣，千萬勿以為意。……吾師埋頭工作垂教幾十年，對於國家貢獻，對於青年之培植，對於學術之發展，有目共睹，決非不學有術者所能影響絲毫也。目前與經國先生談及，亦以為將好事之徒不加理會為宜。」⁵⁷既已得到蔣經國的支持，加之先前「中美互換研

50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4月3日，頁481。

51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4月13日，頁484。

52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0年1月9日，頁160。

53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5年11月30日，頁609。

54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6年7月10日，頁659。

55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6年7月1日，頁657。

56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6年7月22日，頁662。

57 李煥，〈致郭廷以〉，1967年12月22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郭廷以檔案」，檔號：069-01-02-042。

究資料計畫」事先獲其授權，郭廷以猶如手握「尚方寶劍」，誰人可奈之何？因此，他雖然不時接受行政院、立法院的質詢，始終未被國民黨情治部門投入圈套，就連一般的網羅定罪也沒有真正辦到。

在郭廷以內心深處，一直在兩種理想之間糾結：如何在個人著述與近史所行政事務之間求取平衡。由於將太多精力用於所務經營，不免耽擱了個人的學術創作。當近史所根柢已立、前途無憂之時，⁵⁸便在何廉、韋慕庭、費正清運作之下，於1969年飛往檀香山，安心著述。⁵⁹後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持續資助下專心撰寫《近代中國史綱》。

雖然身處萬里之外的大洋彼岸，仍需接受行政院與立法院的跨洋質詢。⁶⁰對於臺灣當局此舉，郭廷以雖無可奈何，但並不沮喪。他向李煥直言：「近聞安全當局於弟留此頗不放心，原無足怪，以近年有關弟之浮言不少，主其事者，自不得不慎重將事，弟毫不在意。」⁶¹在美撰寫《近代中國史綱》期間，他多次向蔣經國報告寫作進度：「近代史上冊初稿已畢，約卅餘萬字，一俟修正謄清，當先郵請指正，並煩代呈教育長。旬前曾專函陳報。夏初將去哥倫比亞，續撰下冊，屬民國時代，尤望教育長有以指教為幸。」⁶²

對於郭廷以此番去美動機，外間或多以為不堪政治壓迫、所內人事傾軋而去，蔣經國卻心知肚明。得知《近代中國史綱》寫就之後，蔣親自寫信祝賀：

廷以先生有道，愧擱綏時，奉讀手教，備興居清健，並承存注，且慰且感。先生旅居國外，致力著述，名山事業，所成益多，獲訊至佩。溽暑已

屆，尚望為道珍重。⁶³

對於蔣經國的賞識，郭廷以感激在心。因此，縱使兒子勸其加入美國國籍。他也沒有答應，為的就是能在心理上支持國民黨。

五、心懷國家大事

郭廷以雖早在1924年便已加入國民黨，內心深處也具有「反共情節」。不過，他始終未公開撰文抨擊中共，亦不以國民黨正統史家自居，而是秉持不偏不倚的學者立場，嘗言「歷史是一門鄭重的學問，一涉偏私，貽誤後人。」⁶⁴雖以並無驚人筆自謙，更不願妄加私見，僅就所知道的點滴平實寫出。不同於一般文化宣傳著作動輒以「毛匪」、「匪軍」、「共匪」稱呼共產黨及其軍隊，郭廷以躍出國民黨員身分的束縛，在《近代中國史綱》中直以「毛澤東」、「共軍」、「解放軍」代之，這在白色恐怖氛圍肆虐的臺灣尤為可貴。⁶⁵縱使在書寫國民黨失敗緣由之時，郭廷以也敢於直面國民黨的貪汙腐化與失去民心，總能以平和心態敘述之。

事實上，中共對郭廷以著作也是讚賞有加，只是「詆以無立場，為純客觀主義。」⁶⁶對於中共批評其「沒有立場」，依其所見，自是切中肯綮。「二十年前，大陸上對近代（中國）史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一再介紹，主要批評為態度過於客觀，缺少政治立場，可謂知我，新編近代中國簡史，一仍舊習，明知將為雙方所不喜，然仍我行我素。」⁶⁷《近代中國史綱》下限僅寫至1949年，並未延伸到50年代之後的兩岸對立。主因是他對

58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年1月12日，頁462。

59 何廉、劉子健、鄭憲、費正清等多次勸郭廷以擺脫近史所事務，俾能在有生之年在美國撰寫一部民國政治史。

60 郭廷以，〈與錢思亮八〉，1971年6月5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21。

61 郭廷以，〈與李煥一〉，1971年2月15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31。

62 郭廷以，〈與李煥一〉，1971年2月15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31。

63 蔣經國，〈致郭廷以〉，1975年7月21日，國史館藏「蔣經國總統文物」，檔號：005-010502-00045-012。

64 李心顏，〈書後小記〉，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610。

6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84。

66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3年3月7日，頁385。

67 郭廷以，〈致呂實強〉，1974年10月5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郭廷以檔案」，檔號：069-01-02-032。

兩岸發展前景不明，如何下筆頗費斟酌。不過，他並未放棄對 1949 年之後的兩岸政治現狀的觀察，不僅運用「史事日誌」的方式擇要記錄，⁶⁸ 而且還預測臺灣政治現狀走向。胡適在世時，曾借「修憲問題」勸蔣介石退位。對於胡適此舉，郭廷以並不認可，⁶⁹ 明言「目前之修憲問題，如定要作去，應使範圍擴大，不宜只限於總統任期一事。」⁷⁰ 郭廷以漸進式地改革主張與審慎理性的政治預判，在國民黨高層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62 年，中共與印度兵戎相見，郭廷以被副總統陳誠邀去諮詢：

晚應辭修先生宴，到有羅志希等約十人，先談中共、印度之戰，認為中共最終目的在於藏、印間造成一緩衝地區。……談及對中共報導，余謂應積極面對現實，不可自愚自蔽，勿專宣揚敵人之短，亦須承認其長。⁷¹

對於兩岸未來走向，他也有自己的體認：「中國大陸與臺灣之將來，殊難預料，渠（韋慕庭）謂美國政策不致有重大改變，美俄關係亦不可能趨於友好。臺灣經濟社會均向資本主義途徑發展，無法與社會主義相容。」⁷² 1966 年 9 月，在一次黨史會的晚宴上，談及民國史研究及中共問題，「謂如果係毛、劉之爭，劉若得勢恐將與俄言好，對臺灣未必有利。」⁷³

國民黨播遷臺灣之後，無力自保。多數情況下，亦須憑恃美國。在美國遠東戰略布局中，臺灣只是服務本國利益的棋子，並非不可犧牲的合作夥伴。諸如費正清、鮑大可等人均曾向白宮進言，希望讓中共進入聯合

國，而非拒之門外。昔日費正清抨擊臺灣缺乏民主自由，島內不乏認同者。然當其拋出「兩個中國」論調，意欲讓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後，則實實在在觸動了國民黨極為敏感的政治神經。一場規模宏大的「反費正清浪潮」猶如火山爆發一般，迅即噴湧而出。

1966 年 5 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運作之下，一場有 1500 多名學者聯名（主動或被迫）的「致美國人民書」應運而生。⁷⁴ 郭廷以雖對費正清「兩個中國」主張嗤之以鼻⁷⁵，但並不認可臺灣學者對費正清的肆意抨擊，「如定要在美國報紙上刊登，必須縮短文字，避免攻擊個人，一切訴諸理性。」⁷⁶ 縱然理性聲音不為外間理解，但他依然固持己見。縱使中華民國在 1971 年被趕出聯合國，狼狽不堪地丟失「合法席位」，郭廷以亦不願對中共惡言相向，而是希望當局保持克制，反求諸己：「聯合國問題，不必強作違心之言，最好不要多提，不怨天，不尤人，廣結善緣，埋頭苦幹，厚植己力。」⁷⁷ 當然，對於國民黨暮氣沉沉、缺乏進取精神，他也不乏痛心疾首之感：

十餘載來，大都以為在外力維護之下，大可高枕，縱不能重歸故土，要可長期安於海上，缺乏奮進朝氣，惟謀目前自身享樂，營營苟苟，求田問舍。加之正義不張，是非不明，忽視大勢所趨，專逞偏私之見，致令志士氣短，甚或鋌而走險，不知多少青年為之沮喪走險，言之痛心。今後必須對症下藥。⁷⁸

依其所見，臺灣當局若能切實做到洗心革面、努力

68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50 年 2 月到 7 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郭廷以檔案」，檔號：069-01-03-087。

69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0 年 2 月 21 日，頁 169。

70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59 年 4 月 3 日，頁 116-117。

71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2 年 11 月 30 日，頁 366。

72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6 年 6 月 19 日，頁 654-655。

73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6 年 9 月 18 日，頁 675。

74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6 年 5 月 16 日，頁 646。

75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6 年 6 月 19 日，頁 655。

76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6 年 6 月 19 日，頁 654。

77 郭廷以，〈與李煥二〉，1971 年 11 月 21 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 34。

78 郭廷以，〈與李煥二〉，1971 年 11 月 21 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 33。

自救，不失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這樣安慰蔣經國：

聯合國事，誠使人憤慨，亦一有利刺擊，借此徹底檢討，改弦更張。天助自助，但能站穩腳步，來日之事，定可有為。中共到紐約前，自命前進之輩，呼喊不絕，既來後，以往隨聲叫囂者，轉而冷眼以觀。就弟所接觸而言，此儕態度已大有不同，頗望我人大加振作，輕易視聽，以伺天下之變，而以團結地方人士與知識份子為第一要義。⁷⁹

實際上，郭廷以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關注已久。⁸⁰ 在其眼中，蔣經國實為帶領臺灣鳳凰涅槃之最佳人選。⁸¹ 若其及時挺身而出，臺灣未來仍然可期。為此，他從人才、軍事、社會風氣分別進言：

教育學術界應拔取有守有為之才，不必斤斤計較於資歷，廣為搜羅，多加包容，授以權責。政府組織與各項法令，概從簡化。現職人員，大可原薪退休，不必在小處計較。軍事方面，在精而不在眾，徵兵大可減少，服務求嚴甚平。社會風氣，當大力轉移，在上者以身作則，咬緊牙關，渡此大難。⁸²

郭廷以雖然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但始終堅守大中國的民族統一立場。早在抗戰勝利初期，率先撰文首倡「臺灣內地化理論」，主張兩岸同宗同源。三十年之後，他依然對民族未來至為關注，並適時作出預判：「大局如何演變，雖不易測度，一統似為必然。中共受蘇俄

牽掣，一時恐不致採取直接行動，美國亦不致輕易放手，仍思用作對中共要價還價地步。看來全盤明朗化，仍需相當時日。」⁸³ 「臺灣境遇日衰，但不致即有劇變。國際局勢亦不許中共妄動。如經濟仍能自給，內部步驟不亂，當可無事。」⁸⁴

隨著美國與中共關係解凍，不少旅美華人借機返回大陸，尋訪舊友，重溫家國情懷。在郭廷以心中，一直有難以言說的遺憾，唯一的女兒留在大陸，二十年間只能隔海相望。期間雖多次打聽愛女訊息，但遲遲未能恢復聯絡。不同於胡適、傅斯年等人被列入「戰犯名單」，郭廷以從未對中共惡言相向。據說，郭廷以曾經一度收到來自大陸的政治廣播，敦勸其重返故土。設若他經由美國返回大陸，自有現實之可能。不過，郭廷以並未選擇投向中共。誠如三十年前一樣，他再度向蔣經國表露繼續追隨之意，「教育長赤誠為國，身繫安危」，「儻有可效力處，請隨時見示，不論為國家，為教育長，皆所樂為。」⁸⁵ 看到不少舊友返回大陸，他亦偶生「滄海桑田」之感喟：

年餘來中美學者去大陸不絕，所見所聞，如何不同，但短短數周，究能瞭解實況若何，不盡可疑，但已成為一時風尚，有此一行，頗是提高身價。時代之變，有如是者。⁸⁶

自 1948 年離開大陸之後，郭廷以始終未能重返故土。晚年雖有回去省親念頭，但因意外離世，未克實現。⁸⁷ 冥冥之中，或是天意。郭廷以在臺灣追隨國民黨二十餘載，但國民黨並未選擇厲兵秣馬，收復大陸之夢也日漸虛幻，而他自己不得已化作流落異國的浮萍，直至逝世二十年之後才與妻子一起長眠於北京萬全公墓。

79 郭廷以，〈與李煥二〉，1971 年 11 月 21 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 33。

80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0 年 3 月 30 日，頁 176。

81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1964 年 9 月 20 日，頁 520。

82 郭廷以，〈與李煥二〉，1971 年 11 月 21 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 34。

83 郭廷以，〈與徐乃力二〉，1975 年 3 月 8 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 61-62。

84 郭廷以，〈致呂實強〉，1972 年 9 月 30 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郭廷以檔案」，檔號：069-01-02-032。

85 郭廷以，〈與李煥二〉，1971 年 11 月 21 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 34。

86 郭廷以，〈致呂實強〉，1973 年 3 月 18 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郭廷以檔案」，檔號：069-01-02-032。

87 郭廷以，〈與郭蓓蓓三〉，1975 年 6 月 5 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 211。

雖然晚年多次表露回臺居住之意，但臺灣並未成為最終歸宿，就連在師大居住近二十年的寓舍亦未能守住。在此兩重矛盾心態下，他選擇將「中國」（無關政治黨派）作為心靈之所寄，在臨終前顯露了對國家日益強盛的既興奮又歉疚的複雜心態。1975年9月，他給留在大陸的女兒信中寫道：

中國之進步，久在想像之中，近年親身訪問之中外人士，大都均有報導，或當面見告，並談到舊友生活情況及一般人民之欣慰與信心，國家確實日趨強大，誠為歷史上未有之劇變。我等不曾有絲毫貢獻，終望能有機會，並得與你們全家聚敘。⁸⁸

六、結語

蔣經國的禮賢下士，令郭廷以十分感激。設若他可以放棄學術事業，自不難得到重用，被視作左膀右臂，亦在可預見之中。但他深悉政治鬥爭之複雜，始終不願貿然應允。雖未在縱橫捭闔的政壇之中大展身手，但仍

得以接近中樞，成為蔣經國的一員「在野幕僚」。作為一個欽慕學術自由的史學巨匠，郭廷以憑藉絕對客觀的立場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譜系上書寫了濃重的一筆。古往今來，絕大多數史家著史不免有個人好惡羈雜其間，政治立場亦時常左右創作走向，但郭廷以卻超脫國民黨黨員身分的羈絆，憑藉客觀、公正的文筆，在四十多年前撰寫了一部明知為國共「雙方所不喜」卻依然「我行我素」，足以藏諸名山的文化巨帙——《近代中國史綱》。哲人其萎，遺教猶存。時至今日，郭廷以身上仍有許多亟待挖掘的知識財富。比如冷靜理性的政治預判、「一個中國」的鮮明政治立場、絕對客觀的治史標準、超脫門戶之見的寬廣胸襟、純粹自由的交流理念等等。在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各式各樣的著作汗牛充棟，形形色色的理論猶如走馬觀火、格外耀眼。時移勢易，先前風靡一時的史觀不免為今人所揚棄，趨新理論不可避免地被更新之理論遮蔽，但用紮實史料撰寫的客觀歷史，仍是治史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方向。（致謝：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承蒙張朋園先生指示線索，其後又經陳三井先生糾訛攻謬。二位先生厚誼永誌不忘。外審專家提出若干修改意見，自是切中肯綮，一併申謝。）

88 郭廷以，〈與郭蓓蓓四〉，1975年9月6日，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頁216。

Taiwan Fellowship

- Taiwan Studies •Cross-Strait Relations Studies
- Mainland China Studies •Asia-Pacific Studies •Sinology

The Taiwan Fellowship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encourage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rtnerships.

- Taiwan Fellowship offers one economy class roundtrip ticket and monthly stipends.
- The annual application period is from May 1 to June 30 (for grants for Jan.-Dec. the following year).
- The minimum duration of a fellowship is three months, and the maximum one year.

For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out our website at:

<http://taiwanfellowship.ncl.edu.tw> or email: twfellowship@ncl.edu.tw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 Zhongshan South Rd. Taipei, Taiwan 10001, R.O.C

TEL 886-2-2314-7321 FAX 886-2-2371-2126 Website:<http://ccs.ncl.edu.tw>